



中/青/文/库

非正式制度与 村庄公共物品供给

——T村个案研究

温莹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青/文/库

本书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非正式制度与 村庄公共物品供给

——T村个案研究

温莹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T村个案研究/温莹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61-6034-3

I. ①非… II. ①温… III. ①农村—公共物品—研究—中国 IV. ①F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558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18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青文库》编辑说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在中央团校基础上于1985年12月成立的，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唯一一所普通高等学校，由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共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立以来，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的办学思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学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命名的大学生KAB创业教育基地。学校与中央编译局共建青年政治人才培养研究基地，与北京市共建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研究院和青少年生命教育基地。

目前，学校已建立起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继续教育和团干部培训等在内的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格局。设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少年工作系、社会工作学院、法律系、经济系、新闻与传播系、公共管理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等9个教学院系，文化基础部、外语教学研究中心、计算机教学与应用中心、体育教学中心等4个教学中心（部），轮训部、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等3个教学培训机构。

学校现有专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管理学5个学科门类。学校设有思想政治教育、法学、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学、经济学、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新闻学、广播电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汉语言文学和英语等13个学士学位专业，其中社会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为教育部特色专业。目前，学校拥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和应用经济学等6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和1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同时设有青少年研究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国志愿服

务信息资料研究中心、大学生发展研究中心、大学生素质拓展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

在学校的跨越式发展中，科研工作一直作为体现学校质量和特色的重要内容而被予以高度重视。2002年，学校制定了教师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条例，旨在鼓励教师的个性化研究与著述，更期之以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涌现。出版基金创设之初，有学术丛书和学术译丛两个系列，意在开掘本校资源与移译域外菁华。随着年轻教师的剧增和学校科研支持力度的加大，2007年又增设了博士论文文库系列，用以鼓励新人，成就学术。三个系列共同构成了对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多层次支持体系。

十几年来，学校共资助教师出版学术著作百余部，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管理学、新闻与传播等学科。学校资助出版的初具规模，激励了教师的科研热情，活跃了校内的学术气氛，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在特色化办学愈益成为当下各高校发展之路的共识中，2010年，校学术委员会将遴选出的一批学术著作，辑为《中青文库》，予以资助出版。《中青文库》第一批（15本）、第二批（6本）、第三批（6本）出版后，有效展示了学校的科研水平和实力，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本辑作为第四批共推出12本著作，并希冀通过这项工作的陆续展开而更加突出学校特色，形成自身的学术风格与学术品牌。

在《中青文库》的编辑、审校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认真负责，用力颇勤，在此一并予以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公共物品供给与集体行动困境	(1)
1.1 问题的提出	(2)
1.2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研究	(4)
1.3 个案的选定与研究方法	(14)
1.4 本章小结	(17)
第二章 非正式制度与个体行动	(18)
2.1 理论来源:制度学派	(18)
2.1.1 旧制度学派	(19)
2.1.2 新制度学派	(21)
2.2 制度分析:制度影响个体行动	(27)
2.3 本书的分析视角:非正式制度	(29)
2.4 本章小结	(32)
第三章 单姓宗族村庄	(34)
3.1 村庄基本概况	(34)
3.2 单姓宗族村庄	(35)
3.3 村庄宗族的组织形式和权力结构	(40)
3.4 本章小结	(43)
第四章 T 村的公共生活及其非正式制度	(46)
4.1 村庄公共生活:传统习俗与活动	(46)
4.1.1 农历四月初十	(46)
4.1.2 农历八月十五	(51)

4.1.3 冬至	(54)
4.1.4 元宵佳节	(54)
4.2 公共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	(55)
4.2.1 习俗与“头家轮流制”	(57)
4.2.2 惯例与俗语	(61)
4.3 本章小结	(63)
第五章 T村的公共物品供给	(64)
5.1 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65)
5.2 T村公共物品分类	(69)
5.3 T村非生产性/宗族性公共物品供给	(70)
5.3.1 宗祠	(70)
5.3.2 太祖墓	(72)
5.3.3 宗庙:田公元帅宫殿与圣母宫殿	(73)
5.3.4 寺庙:佛宫与教忠寺	(75)
5.4 T村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	(77)
5.4.1 农田水利灌溉	(77)
5.4.2 生活饮用水	(78)
5.4.3 学校	(78)
5.4.4 道路	(79)
5.5 非正式组织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	(82)
5.6 本章小结	(85)
第六章 T村的非正式制度与公共物品供给(上)	
——“头家轮流制”与村庄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	(87)
6.1 T村的非正式制度与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	(90)
6.2 “头家轮流制”	(90)
6.3 作用机制	(104)
6.3.1 多中心制	(105)
6.3.2 作用过程	(107)
6.4 本章小结	(109)

第七章 T 村的非正式制度与公共物品供给(下)

——“八月十五修路”习俗与村庄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	(112)
7.1 T 村的非正式制度与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	(113)
7.2 “八月十五修路”	(115)
7.3 作用机制	(117)
7.3.1 社会习惯记忆	(117)
7.3.2 作用过程	(120)
7.4 社会习惯记忆作用的延伸	(123)
7.5 本章小结	(124)

第八章 整合式的非正式制度

8.1 研究发现	(126)
8.1.1 缺乏正式的宗族组织并不妨碍村庄对宗族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127)
8.1.2 分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新视角:非正式制度	(128)
8.1.3 非正式制度通过“多中心制”和“社会习惯记忆”的机制发生作用	(130)
8.2 “多中心制”与“社会习惯记忆”	(132)
8.2.1 共时性和理性的“多中心制”	(133)
8.2.2 历史性和非理性的“社会习惯记忆”	(134)
8.2.3 多中心制的延续依赖于社会习惯记忆	(135)
8.3 整合式的非正式制度	(138)
8.3.1 不可替代的非正式制度	(138)
8.3.2 非正式制度的来源与作用	(139)
8.3.3 从社会退出的制度分析	(143)
8.3.4 整合式的非正式制度	(145)
8.4 研究不足与展望	(148)
8.4.1 研究不足	(148)
8.4.2 研究展望	(149)

附录 1 T 村地图	(152)
附录 2 半结构式访谈提纲	(154)
附录 3 访谈对象	(156)
附录 4 调查问卷	(157)
参考文献	(163)
致谢	(178)

第一章 公共物品供给与集体行动困境

所谓农村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由农民或其家庭自己消费的“私人物品”而言的，是由当地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共享的“产品”，换句话说，即是农村中私人不愿意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产品（熊巍，2002）。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社区的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尤其是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虽然农民的负担得到切实减轻，但随之而来的是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税费减少，原先主要依靠农业税为资金支持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在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又加重和恶化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李建军，2010）与此同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的良性运行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李建军，2010）。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是，现有研究有许多不足：首先，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对策和供给制度的变迁等理论上的分析探讨，而较少有学者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其次，已有的理论分析框架侧重于宏大的正式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普遍性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进行研究，较少有学者做深入的实证个案研究，探讨村民个体的行动逻辑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并分析其特定的村庄环境（非正式制度）可能通过影响村民个体的行动逻辑和参与程度，最终影响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

1.1 问题的提出

本书通过对一个个案村庄的实证研究与分析，试图了解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个体村民是如何被组织与动员起来，积极参与到公共物品的供给活动中（捐资或者投入义务工）？是哪些因素促使村民在集体行动中克服了“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现象，促成村庄公共物品的成功供给？最终试图揭示是怎样特定的村庄环境（侧重于非正式制度）形塑着村民的行动逻辑、影响着他们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程度，最终影响着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情况？

在本书中，我们将个案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简单划分为生产性公共物品和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生产性公共物品是指村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生产性公共物品不仅便利了村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农民在生产上的效益，有利于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生活饮用水、学校、道路、路灯等。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主要是生活性的公共物品，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提供可以便利村民的生活，但不是村民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它的提供与否一般不会对村民的生产活动产生影响。主要是指村庄中与宗族、宗教活动相关的公共物品和项目，主要包括：村庄中修建的宗祠、宗庙、寺庙以及村庄每年例行的宗族活动中所涉及的公共集资与相关事务等。我们将具体考察个案村庄各项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情况。

本书重点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考察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旨在揭示村庄中的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了村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行动逻辑和参与程度，进而影响到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情况。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关注的是宏观的经济或正式制度设计因素的影响，较少关注特定的村庄环境因素。迟福林用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和农业投入比重下降来说明国家的财政投入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迟福林，2003）；张军和何寒熙则认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原有公共财政制度的崩溃，地方财政收入的萎缩，农户投入激励不足造成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下降的困境（张军、何寒熙，1996）。林万龙认为长期以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外筹资机制遏制了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林万龙，2002）；刘鸿渊则指出现

阶段“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存在不合理与操作上的困难同样制约着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刘鸿渊，2004）。实际上，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与政府的财力、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供给制度相关，而且与特定的村庄环境以及村庄农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的中国农村社区属于熟人社会，比较容易建立互信和合作，而且传统乡村社会中乡绅在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荣德，2000）。在集体化时期，虽然传统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但国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建立的垂直控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公共物品的提供。但是，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回撤，一些地方基层组织涣散，致使许多地方的公共物品不能有效供给（曹锦清，2000）。例如，有的学者观察到，一些村庄的村民虽然已经脱贫多年，却没能够组织起来修复“大跃进”时期挖的水塘和兴修道路（潘维，2003：157）。所以，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制度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村庄整合以及村民主体的参与程度问题。但目前制度安排上，与城市社区的情况不同，农村社区的公共物品主要靠农民自己供给，这就使得村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显得十分重要。近年来，除了国外的一些研究关注到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社会因素的关联外（如 Habyarimana and Humphreys, 2006; Anderson, Mellor and Milyo, 2006），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集体行动和利益博弈的框架，分析农民的参与情况对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陈潭、刘祖华，2009；贺雪峰，2006；刘能，2007；李海舰，2010；陈潭、刘建义，2010）。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在社会互动中，人们会设计一系列的社会博弈规则——即制度——去制约人们的相互行为。这些约束条件可以有意识设计的正式规则/制度（包括政治/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也可以是非正式规则/制度，包括禁忌、社会规范及传统习俗等（诺斯，1994：64）。按照诺斯的观点，我们发现，事实上在中国乡村地区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如各种民间信仰、宗族及宗教仪式、道德观念、民间风俗、社会习惯甚至社会舆论等。它们是在特定的乡村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国家正式法律法规等共同制约着村民行为，对村庄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实践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王冬梅、李小云，2010）。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仔细考察个案村庄的历史与社会结构，

以及由于这些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催生的各项非正式制度。进一步着重探讨这些在村庄中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村民的行动逻辑，并通过影响村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程度，最终影响村庄中各项公共物品的供给情况。

由此，我们将按照以下的文章结构安排，对以上所要研究的问题逐步展开讨论：第一章是导言部分，将介绍本书所研究的问题、研究方法以及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综述；第二章是理论框架，介绍本书的理论来源，在梳理了相关理论派别的发展后，提出本书所运用的具体分析视角——非正式制度；第三章开始进入研究问题的探讨，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将呈现个案村庄的具体情况，基于实证研究，从提出问题到验证问题。具体是，第三章呈现个案村庄的基本概况；第四章介绍村庄的公共生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各项非正式制度；第五章由村庄的公共生活引出了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情况；然后，我们用第六章和第七章两章的篇幅，验证村庄中的非正式制度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作用。第八章是总结，总结了本书的几个发现，并对研究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最后，也简要总结了本书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今后的研究展望。

1.2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研究

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的农民，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为了便利人们的公共生活、满足人们各项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换句话说，人们相信，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是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责（张晓波，2003）。所以，世界各地的老百姓都在争取，希望他们当地的官员能提供学校以使孩子获得教育、提供公路以使他们的商品能通向市场、提供安全的水以供饮用（蔡晓莉，2006）。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有着同样的期待，但结果却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了以农业补给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策略。国家有意识地将财政资金投入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由此形成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受此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的农村和城市不得不实行两套不同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城市所需要

的公共基础设施都由政府来提供，其公共项目投资由国家财政支付；而农村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由县、乡镇政府来提供或者由农民自己解决，上级政府只给予适当的补助。正如 Tsai 指出的，在中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他们主要依靠所在村提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如灌溉、饮水和道路交通等。农民上缴大量税费，但从中央政府得到的财政再分配和转移支付却很少（Tsai, 2000）。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需的资金并没有被纳入正式的国家财政制度中。在中国农业基础薄弱和农村经济欠发达的背景下，这种仅靠制度外筹资的方式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效力十分有限。首先，这种供给模式没有稳定的专项资金支出保证，必然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总体不足。李燕凌利用对数模型，得出农民的交通运输及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医疗卫生保健三项公共物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远大于 1，反映出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李燕凌，2004）。财政资金的投入是公共物品供给的核心必要条件，资金缺位是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张军和何寒熙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原有的公共财政制度崩溃，地方财政收入萎缩，农户投入激励不足造成了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下降的困境（张军、何寒熙，1996）。王磊用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和农业投入比重下降的具体数据呈现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农村教育和社保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总体不足现状（王磊，2004）。其次，农村现有的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模式中的政府责任缺失，也容易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困境。马晓河指出，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策略，规避了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供给责任由中央向地方政府层层推卸，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负担最终大部分落在了农民身上，而农民是缺乏负担供给责任的能力的。从财政上，农民负担不起，从供给机制上，政府管死了一切，第三方无法进入，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难以参与（马晓河，2005）。

不论是财政资金缺位，还是供给主体及供给责任不清，都会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造成严重困境，从而影响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不过，这些影响因素都是显性和外在的。那么，从深层次来看，真正影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本质因素有哪些？已有的治理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提供了不同的三大预测：制度设计、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市民社会及社会资本）。具体来说，第一种观点强调制度设计的重要性，良

好的治理依赖于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行政制度；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因素决定着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良好的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分歧；第三种观点则重视社会因素，即社会资本因素，并认为特定的组织和制度对政府的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蔡晓莉，2006）。这三种理论预设同样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分析框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分别从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体行动四个方面对已有的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

第一，正式制度因素：制度设计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已有的治理理论一直在强调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正如奥斯特罗姆指出的，良好治理的关键是能否设计出一种公民或更高级别政府可以对官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裁的民主行政制度（奥斯特罗姆，2000）。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而制定的一系列关联性的规则和制度的集合，它主要包括决策机制、筹资机制和生产管理机制（高鉴国，2008）。不过并非所有的制度安排都一定会带来良好的治理结果。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来看，情况确实不尽理想。张琳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进行研究综述，总结了我国学者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达成的一些共识。他们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供给总体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责任划分不清、供给主体错位缺位和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张琳，2007）。从本质上来说，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时期一直沿袭至今。李建军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变迁后指出，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路径变迁中依然沿袭着制度形成初期的一些特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仍然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者；二是农民仍然是公共产品成本的实际支付者（李建军，2010）。国内学者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制度外筹资机制的不合理和供给行政制度的缺失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带来许多困境。林万龙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筹资供给的历史和现状做了详细介绍，认为现有的供给制度存在供给决策的自上而下和单中心体制、多元供给的缺乏规范、成本分摊的累退效应等特征（林万龙，2002）。

这样看来，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存在的问题似乎都指向了现有供给制度的安排。因为这一套制度设计中，存在不合理的筹资机制、没有权责明确的行政制度（决策和管理机制）、也没有有效的民主

监督制度。但现有的文献并不足以说明不同的制度设计会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产生怎样不同的具体影响。不合理的筹资机制或不合理的生产管理机制是否真的对公共物品供给有影响,还未得到研究的证实。不过国外有些学者从民主制度的视角对公共物品供给做了研究。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民主治理确实对公共物品供给有影响(Lizzeri, Persico, 2001; Besley, Burgess, 2001; Besley, Coate, 2001)。Lizzeri 和 Persico 认为,按照“公共物品需求增加论”,政府还选举权于民的同时应该增加公共物品支出,而不是增加转移支付(Lizzeri, Persico, 2003)。按照他们的观点,民主选举可以促进政府加大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不过,国内的学者张晓波、张林秀等基于2000年在江苏境内6个县市共计60个村庄的调研数据分析表明,单靠选举不一定能增加村财务支出中公共投资的比例,只有真正实现决策权分担以后,公共支出中用于公共投资的比例才会增加(张晓波, 2003)。Tsai 于2001年对中国七个不同省份的316个村庄进行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与民主理论预测相反的是,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施行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并没有很强的积极影响(蔡晓莉, 2006)。

在制度安排层面,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只是作了理论上的探讨,极少数的学者对我国现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设计进行实证研究。我们仍然难以确定现有的制度安排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它的效用。现有供给制度中,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外筹资供给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影响着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在缺乏民主制度的环境下,公民无法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及其供给行为进行有效监督,这是否意味着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完善的管理监督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第二, 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也不仅仅是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同样重要的还有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关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张秀生研究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张秀生, 2008)。于丽敏研究了农村公共物品不足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于丽敏, 2003)。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反过来,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当地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从理论上讲,如果控制住所有其他的影响因

素,单从经济发展角度考察其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我们可以认同治理理论预测的第一个观点:是经济因素而不是社会因素决定着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因为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意味着该地区将拥有更多用于投入公共物品的财政资金和资源。不仅是居民可能拥有更高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为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财政税收。这样,不论是制度外筹资还是制度内筹资,当地的公共物品供给都会拥有更多的财政资金保证。而不管怎样,财政资金总是公共物品供给的核心必要条件。所以从理论上推测,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当地的公共财政状况,从而影响该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政府拥有更多的税收和充足的财政资金,并不能保证政府用于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也必然增加。Tsai 在中国农村的研究数据表明,经济因素对中国农村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她用具体数据说明了农村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给当地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税收可能促进了当地公共物品更好地供给,但并不与当地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投入成正相关(Tsai, 2007)。由此看来,经济发展也并不必然与良好的治理相关(蔡晓莉, 2006)。换句话说,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促进当地的公共物品供给。在复杂的现实社会环境下,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们是否可以认定经济因素对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因素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对于这些问题,已有的研究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第三, 社会因素: 社会资本、连带团体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根据已有理论提供的三大预测,除了制度安排和经济因素,还有学者从社会因素的视角去考察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这里的社会资本着眼于市民社会和社会资本,并认为特定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对政府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不同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不尽相同,相关的经验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定义也存在差异(参看Lochner, Kawchi and Kennedy, 1999; Onyx and Bullen, 2000; Barayan and Cassidy, 2001),这里我们主要借鉴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美国学者帕特南(Robert Putnam)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信任、互惠的规范以及网络等特点,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Putnam, 1993)。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政府